



# 吴语和闽语的关系

覃 洲

**摘 要：**汉语方言关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吴语和闽语的关系成为焦点问题之一，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探析吴语和闽语的历史渊源、吴闽方言在语音上的联系、吴闽方言在词汇上的联系、吴语和闽语的地域接触、吴语和闽语的民族语底层，来揭示吴语和闽语的关系。

**关键词：**汉语 吴方言 闽方言 地域接触

## 一、引言

汉语方言关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吴语和闽语的关系成为焦点问题之一，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983年，罗杰瑞在《方言》杂志发表《闽语中的古方言字》一文，之后吴闽方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吴闽方言关系的论著也越来越多。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发清晰地呈现出来。

周振鹤和游汝杰（1986）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指出：“闽语的主要渊源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时期从江浙一带迁入的。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和当地闽越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不大相同的闽语。”“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丁邦新（2006）则进一步指出：“南北朝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王士元、邓晓华主张“南方汉语非‘汉’说”，认为吴语和闽语并非土生土长，也绝不全是北方迁入。潘悟云（2009）认为：“汉语的东南方言并非是从汉语北方方言中分化出来的，而是北方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产生的新语言。”张光宇从移民史、方言史等角度考察了吴闽方言的历史渊源。戴黎刚（2012）在《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中具体划分某些闽语词的音读层次时同吴语的音读作比较，从而确定了闽语和吴语的同源关系。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更明了吴闽方言之间的关系。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综述

以前的汉语方言研究更多从共时角度描写方言本身，缺少对方言的历史演变和层次构成的研究。而今汉语方言研究不仅有描写的任务还有还原汉语方言历史源流、历史演变以及探究各方言间关系的任务。

在进行吴语和闽语的关系研究之前，首先要确定，吴语和闽语究竟是两种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在国内学界，几乎都认为吴语和闽语不过是汉语的地方

语言的变体。然而在国外，很多汉语方言都被当作是一门独立语言，有着自己的语言编号。毕竟有些西欧国家的语言之间的差异比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还要小。确定立场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进行吴语和闽语关系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认为它们是两种不同语言，那么两者之间的“接触”就是研究的重点，如果认为两者是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那么“同源”关系才是研究的重点。两种主张并没有对错之分，不同的立场关系不同的研究方法，方法得当，我们都可以无限地接近真理。在这里，我们认为，吴语和闽语尤其是闽语有少量的民族语言底层，但其语言主体同出一源，在把二者看作同一语言的两个变体的同时，不能忽视吴语、闽语形成稳定之后两者之间的接触影响。

历史层次分析和方言史的考察是我们应用的主要方法。考古学中有“层次”这一术语，是指不同地层层次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面貌，它们的叠加是历时的，而语言的历史层次是指叠加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不同来源的语言成分。考古学的层次分析方法是进行语言研究所要借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从共时层面出发把吴语和闽语中的不同时代层次离析出来，再做比较，找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运用历史地理方法，考察吴语和闽语地区在历史上的交流融合、人口的流动等等，进而考察对方言的影响。两者结合，相辅相成。

研究内容主要是吴语和闽语的历史渊源、语音层次上的对应、方言成熟后的接触影响、语音词汇上的联系这几个方面。

## 三、吴闽方言概述

### （一）吴语概说

上古时代有关吴语区的居民和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材料很少，文献记载称现今吴语区一带为东夷南蛮，大概分布在今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带。《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史记正义》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我们不必关注“勾吴”一称的起源，因为春秋时代的吴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记·越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

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来而邑焉。”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吴越两国的地望大体就是后来的吴语区域，在荆蛮原居民和周王朝礼乐文化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吴越方言就是吴语的底层。但是底层形态具体如何，限于文献材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窥其一二。

中古时代是吴语疆界逐步定型，吴方言逐步发展变化的时期。汉兴之后，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吴王，文化有所繁荣。到了三国时期，吴语区大体定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北部吴语受北方方言影响深刻。两宋时期同样如此，北方官话不断侵蚀着北部吴语，当然吴语也在不停扩散其影响。

近古时代汉语中各方言都已经基本定型，各方言间的接触影响成为常态。吴语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不是很大。

现代吴语分区大体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安徽一部、浙江大部。北部方言点以苏州等为代表，南部方言点以宁波等为代表。

## （二）闽语概说

闽语是汉语方言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张振兴《闽语的分区》一文中将闽语区分为：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琼文、邵宁七区。各区之间差异很大，甚至无法实现语言交流。其使用范围包括今天的福建省、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小部分除外）、雷州半岛海康徐闻地区、浙江南部部分地区、台湾省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地区。

闽语的历史不像吴语那样久远，闽地的经略很晚才开始，直到秦汉时代才有中原人迁入。东晋末年“五胡乱华”，北人南下，迁居南方，“永嘉之乱”后“衣冠八族”移居闽地，此后历朝历代，陆陆续续都有中原移民南下，这种人口的迁入带来了语言上的动荡和成型。到了宋代，闽语基本定型。

## 四、吴闽方言的历史渊源

唐张籍《永嘉行》云：“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口流动频繁，大量北方人移民至吴地、闽地，把北方话广泛散播到华南地区。这一时期的大量移民运动可以看作是吴闽方言关系发生最为重要的阶段。

罗香林把西晋永嘉之乱后的移民分为秦雍等州移民、并司豫诸州移民、青徐诸州移民三股。“一般人民由于缺乏舟车条件，仓皇离家时多选就近避难。于是，沿海的恒走沿海，内陆的多走内陆。其中和后来闽方言形成有关的是青徐移民和司豫移民。”正是这两股移民开启了吴语和闽语的联系。这两股移民先是聚集到江东地区，构成了东晋政权的基本台柱。东晋政权在“开济政策”下，朝野形成了“共重吴声”的风气。南方士大夫也向北方士人学习“洛下书生咏”。南北的交融使北方人的语言成分里融进了吴语的成分。王仲荦指出，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原因，北人继续南下。“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由此可以得知，移居福建的人多为再度南迁的北人，并非单纯的吴人。

张光宇在对闽语作历史层次分析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闽方言形成的来源有四个层次，西晋时期中原东部青徐移民带来的白读系统、西晋时司豫移民所带来的白读系统、南朝时期的江东吴语层次、唐宋时期通过文教力量传播而来的长安文读系统。笔者认为，其中二、三两个层次是相承接的，也是和吴语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层次。

反过来，历史上也有“闽人北迁”的现象，大约始于唐代，明清为多。这些移民多从闽南闽东沿海一线上达舟山群岛，造成了现在浙南闽语百万人口的格局，成就了语言接触交流最为频繁激烈的第一线。

## 五、吴闽方言在语音上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没法对吴闽两方言作音系上的系统对比，其中有一点重要原因是吴闽两方言内部都很复杂，系统的音系对比因卷帙浩繁而无从下手。因此，我们借助前人已经取得的语音学上的成果，对两种方言在语音上的联系作粗线条的描绘。

1. 作为南方方言的两个代表，区别于北方方言，它们的梗摄三四等字都比较低，多作[ia]。

2. 吴语和闽语的微母都保留了双唇鼻音m的读法，例如厦门方言“问”读作[mŋʔ]，苏州话“蚊”读作[ɿmən]，“尾”作[miʔ]，“微”作[miɿ]。

3. 见晓组二等字在从舌根音变换至舌面音的传播过程中，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只有舌面音一种读法，往外围扩散，却使四周方言产生了文白二读，文读作新近变化的舌面音，白读作原来就有的舌根音。北部吴语就处于这样的影响圈中，但是南部吴语和闽语还是只有舌根音一种读法。

4. 《切韵》同摄三四等在汉语方言中只有吴闽方言还有区别。吴语见于浙南咸山两摄，三等元音较高，四等元音较低，浙南三等原音较高，如[ie]，四等元音较低，如[ia]，闽语不限于咸山两摄，三等读[ia]，四等读[ai]。

5. 咸山两摄三四等在吴闽方言中都有高元音一读[i/iʔ]。这个现象遍布吴语全境，在闽语区中主要见于闽南。

## 六、吴闽方言在词汇上的联系

有关吴语、闽语词汇上的联系同样没法做系统的比较分析，所能描述的只有一些简单例子。

（1）第三人称代词，南方方言大都说“渠”，吴方言中“伊”“渠”并线，而闽方言中只有“伊”。可见，吴语和闽语“伊”的说法关系密切。

（2）“麻糍”这种将糯米蒸熟后捣碎制成的食品名称的主要使用区域就是吴闽方言区。

（3）“油炸饼”这一词汇主要保留在山东方言、江浙吴语和福建闽语中。上述青徐移民南下江东，再南下至闽地这一移民史，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可以为这一现象作一合理推测：南朝时期的青徐移民将“油炸饼”的做法和称呼带到了吴地，若干年后又南下带入闽地。作为食品，常吃常说，语言的流变并不明显，这一词汇就分别保存在了山东方言、吴语和闽语当中。

（4）“站立”在吴闽方言中都作“倚”。

（5）“行”被罗杰瑞教授列为“南方汉语”的共同质素，北方话中多用“走”字来表达行走义，但是在南方汉语中多用“行”。吴语虽然有些边缘化，受北方汉语影响甚多，但是在某些地区还保留有“行”的说法，如浙江龙游等地。



以上五则材料描述的是现今吴语、闽语方言中词汇的对应现象，下面再举几条现今闽语保留前朝（泛指中古时期）词汇与吴语词汇对应的例子。

(6) 袷，《方言》：“掏袷谓之袖。”郭注：“衣襟音袷，江东呼袷宛，音婉。”今闽语中多称衣袖为“手袷”。

(7) 木戲，《方言》：“陈楚宋魏之间或谓之箒，或谓之木戲。”郭注：“瓠勺也，今江东通呼勺为木戲，音羲。”《广韵》作“櫛”，许羈切，“杓也”。今沿海闽方言中还有好些带“櫛”字的说法。

(8) 豨，《尔雅》：“豨，子猪。”郭注：“今亦曰彘，江东呼豨。”今闽北、闽中均呼猪为“豨”，建欧音[<sup>h</sup>ɕi]，泳安音[<sup>h</sup>ɕi]。

(9) 闽语称“晚上”为“冥”，这一词汇虽然并没有保留在现今吴语方言中，但是在南北朝时代的吴歌里出现了。在《读曲歌》中，八十九首之三十九：“合冥过藩来，向晓开门去。”八十九首之四十八：“诈我不出门，冥就他依宿。”八十九首之五十五：“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其中“冥”都是指晚上，和闽语的用法一致。

#### 七、吴语和闽语的地域接触

无论是方言形成之初，还是方言格局已经很成熟的现代，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未停下来过。相邻方言间的不断接触正一步步加深着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关系。

日常生活中常说浙江人讲吴语、福建人讲闽语，但是落实到具体方言分区上时，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南区吴语可分成四片，其中东瓯片交杂有闽语，像温州地区和舟山群岛就有大量闽语使用人口。

在闽语对吴语区渗透的同时，南部的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吴语处衢片的地域分布十分复杂，浙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北都是其所辖范围，不仅和闽语交错，和赣语以及客家话也有交错。福建北端的蒲城有很大一部分地域和人口都使用吴语，闽北的建瓯方言也受到南部吴语影响。张双庆、郭必之联合撰文《从石陂话“水类字”看浙南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文章将闽语五地（福州、厦门、沙县、建瓯、石陂）方言中“深、鼠、碎、水、手、书”等字的读音做了统计比较，分析指出，原本在闽语中声母应读为塞擦音，但是闽北系闽语（建瓯、石陂）却发生了擦音化，其原因正是南部吴语的影响。石陂与蒲城邻近，两者方言的接触十分紧密。产生这种不合闽语特点的现象正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 八、吴语和闽语的民族语底层

民族语言学者认为，吴闽地区古时拥有大量百越人口，他们是当地的原居民，吴语、闽语是北方汉语不断南下并和当地语言接触融合之后逐渐定型的。邓晓华就直接提出“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罗杰瑞在提出吴闽关系假说后进而提出“古南方话假说”。

可以肯定的是，在上古时代，东南方言中存在民族语的成分，然而其存在的多少我们很难进行有效的推定。笔者认为，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南迁，文化的交流，整体地域的融合，民族语的成分已经微乎其微了，到如今，我们能在东南方言里找到多少民族语的底层已经很难说了，找到的和民族语言类似有同源关系的例证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民族语的底层也很难说。潘悟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利用复旦大学南方汉族人遗传基因库的资料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南方汉族人中北方汉族的遗传基因贡献巨大。可以想见北方汉语对南方汉语的影响之深。所以，若说民族语的底层已微不足道甚至消失，并非无稽之谈。因此，有关体现在吴闽方言关系中的民族语底层不为我们探究的对象。

#### 九、结语

本文回顾了前人对吴闽方言关系研究的论述，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得出：闽方言中有混杂了南朝时代吴语特征的北方方言层次，两者在移民过程中产生了层次联系。相较而言，闽方言更好地保留了古汉语的语言特点。吴语和闽语的关系具体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另外，由于地域上的毗邻，浙南和闽北方言的交错影响让吴闽方言关系显得更为复杂而密切。

#### 注释：

Southern Chinese 罗杰瑞“古南方话假说”，包括闽、粤、客，吴语实际上被边缘化。

此处例子引自丁邦新《从历史层次论吴语关系》，《方言》2006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张光宇.东南方言关系综论[J].方言,1999,(1):33-44.
- [2]张光宇.论闽方言的形成[J].中国语文,1996,(1):16-26.
- [3]张光宇.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J].中国语文,1994,(6):409-418.
- [4]张光宇.罗杰瑞教授和汉语史研究[J].语言研究,2014,(2):115-127.
- [5]张光宇.共同保留、共同创新与共同脱轨[J].语言研究,2006,(2):14-21.
- [6]潘悟云.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模式[J].方言,2009,(3):193-203.
- [7]秋谷裕幸.吴语处衢方言中的闽语词——兼论处衢方言在闽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作用[J].语言研究,2000,(3):99-106.
- [8]张振兴.闽语及其周边方言[J].方言,2000,(1):6-19.
- [9]乔全生.历史层次与方言史研究[J].汉语学报,2014,(2):2-12.
- [10]丁邦新.从历史层次论吴闽关系[J].方言,2006,(1):1-5.
- [11]王建设.从《世说新语》的语言现象看闽语和吴语的关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98-104.
- [12]张双庆,郭必之.从石陂话“水类字”看南部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J].方言,2005,(3):193-197.
- [13]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4]戴黎刚.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15]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 [1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